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24.02.001

柯研、毕洪业：“国际秩序建构路径中的共有观念：中国与美俄国际秩序观的差异分析”，《太平洋学报》，2024年第2期，第1-16页。

KE Yan, BI Hongye, “Shared Ideas in the Path of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in Views on International Order of China, the U.S. and Russia”, *Pacific Journal*, Vol.32, No.2, 2024, pp.1-16.

国际秩序建构路径中的共有观念： 中国与美俄国际秩序观的差异分析

柯研¹ 毕洪业¹

(1.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201620)

摘要:国际秩序是国际问题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自国际关系学科形成以来便备受关注。历史上每一次国际秩序的更迭都是以权力平衡为主要路径,然而权力平衡并非国际秩序建构的唯一路径,共有观念建构也是国际秩序建构的重要路径。在中美俄互动中,基于对国际秩序认识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国际秩序观。较于美俄的权力平衡,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国际秩序观,突出强调了共有观念的作用。共有观念在国际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包容性共有观念建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共有观念;国际秩序;中美俄互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政治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24)02-0001-16

在国际问题的相关研究中,国际秩序作为重要议题而广受关注。自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处于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之中,各国对国际秩序的转型与走势有着不同看法,因此产生了不同的国际秩序观。中国、美国与俄罗斯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国际秩序观对国际秩序建构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中美俄在历史与文化等领域的差异性,导致三方在国际秩序观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进而形成了中美俄在国际秩序方面的互动。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国际秩序的转型日益加剧,中美俄之间的相关博

弈也日益复杂化。在此背景下,中美俄在国际秩序观中所表现出的差异性值得学界关注。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参与日益深入,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受此影响,近年来中国学界对国际秩序的讨论增多,同时有关于中美俄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互动也备受关注。冷战结束后,旧有国际秩序被解构,国际秩序总体上从所

收稿日期:2023-04-13;修订日期:2023-08-10。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俄乌冲突后俄罗斯构建‘后西方世界’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研究”(22JJD810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柯研(1994—),男,河北秦皇岛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欧亚研究、国际秩序、和解外交;毕洪业(1969—),男,黑龙江兰西人,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和大国外交、俄罗斯外交战略与政治转型。

*作者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谓“单极时刻”向多极均势的方向演进,在此期间,在美国对世界秩序单向构造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美国霸权为主宰、“西方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随着国际力量的变革,“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严重危机。目前国家主体、利益以及观念的多元化,国际议事日程的复杂化与多样化,国际格局中“多极化”和“无极化”的趋势并存。有观点认为,国际秩序开始从基于西式规则向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转变。^① 在国际秩序观方面,一国的国际秩序观往往受其文化影响,具有明显的文化特质。在霸权护持的前提下,美国国际秩序观一直被斗争逻辑主导,其主导国际秩序往往通过霸权推行。而中国受其传统义利观影响,追求本国利益与各国利益之间的公约数。^② 与此同时,本国身份认知对于国际秩序观的塑造有着内在建构的影响。^③ 就国际秩序中的大国博弈而言,中美在国际秩序方面的博弈是一种意识形态之争,结合当前美国外交实践来看,美国正在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随着两极化趋势愈发明显,国际社会需要避免“新冷战”的同时,更要主动地营造新的国际合作环境和建构新型国际关系。^④ 俄乌冲突爆发后,中美俄三边基本形成了中俄合作应对美国“双遏制”的态势,一系列博弈将对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⑤

与国内研究相比,无论是对国际秩序的学理性讨论,还是对中美俄在国际秩序问题上互动的关注,国外研究都早于国内。相关研究成果更深入,整体上也更系统化。对于国际秩序的学理性探究,三大主流理论有着不同的观点。现实主义认为均势是国际秩序的必要条件,其管理方法需要通过商定与国际合作来改善、加强。^⑥ 自由制度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认为,二战之后,美国及其伙伴构建了覆盖广泛的国际秩序。冷战结束后,这种秩序向外扩展。随着战后秩序的扩展,其治理机构也相应得到发展。^⑦ 自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者将观念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以来,观念成了相关研究中的重要考量因素。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

认为观念与制度在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常被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忽视,而施动性可以是观念性或规范性的,又可以是物质性的,规范的建构除了实力支持之外,也可以在缺乏物质强大国家支持的条件下通过社会文化的互动进行建构。^⑧ 由此,国际秩序由国家性向社会性转变。^⑨ 就国际秩序现状而言,非西方国家力量的壮大表明世界会呈现多极化,但并非俄罗斯外交政策中预想的多极化秩序,而是一种失序状态。结合中美俄互动,美国将中俄视为“自由国际秩序”的“破坏者”,然而自由秩序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美国造成的,随着俄罗斯战略东移,中俄合作建构了新的平衡。^⑩ 对于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有观点认为二战后美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并不具备世界性,国际秩序将逐渐显现出复合性。^⑪ 从国际格局视角出发,目前国际

① 王明国:“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秩序转型——基于国际制度视角的分析”,《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第36-54页。

② 孙通、刘昌明:“国际秩序观建构中的文化特质——兼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渊源”,《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2期,第13-24页。

③ 舒伟超:“身份认知与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建构”,《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1期,第156-164页。

④ 杨洁勉:“中俄美欧战略互动特点和发展趋势”,《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3期,第30-50页。

⑤ 毕洪业:“‘战略三角’还是‘三边互动’:新时代的中美俄关系”,《国际观察》,2022年第3期,第127-156页。

⑥ [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世界秩序》,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286-296页;De Graaff, Naná, and Bastiaan Van Apeldoorn, “US-China Relations and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Contending Elites, Colliding Vis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 No.1, 2018, pp.113-131.

⑦ G. John Ikenberry, “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 No.1, 2018, pp.7-23.

⑧ [加]阿米塔·阿查亚著,姚远、叶晓静译,张发林校:《建构全球秩序:世界政治中的施动性与变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38-39页。

⑨ [法]伯特兰·巴迪著,宗华伟译:《世界不再只有“我们”:关于国际秩序的另类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8-51页。

⑩ Bobo Lo, “Global Order in the Shadow of the Coronavirus: China, Russia, and the West”, *Lowy Institute Analysis*, 2020; Timofei Bordachev, “Europe, Russia and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Routledge, 2021.

⑪ Amitav Acharya, “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Cambridge: Polity*, 2014, p.37; Joseph S. Nye Jr., “Will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Foreign Affairs*, 2017, Vol.96, No.1, pp.10-16.

秩序存在中美两极化趋势,但对于这种观点的质疑也同样存在。^①

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诸多研究成果大多以本国为出发点,体现出了学科的现实关怀。21世纪以来,受建构主义影响,部分外国学者对观念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进行了探索,近两年来,这一问题也引起了部分国内学者的关注。但是大多数研究成果是一种实然的讨论,亦或是对发展趋势进行学理性探索,研究中缺乏横向视角,未能对不同国家的国际秩序观进行比较分析,由此忽视了不同国际秩序观在建构路径方面表现出的差异性。本文将在既有研究基础上,结合相关官方文献,在对中美俄的国际秩序观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进行横向比较,对中国国际秩序观中的观念建构这一路径进行深入探究,突出观念建构在国际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性。

二、国际秩序建构过程中的共有观念

国家权力是国际秩序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变量。每一次体系内国家权力排序的更迭,也必然伴随着国际秩序的重建。随着国际关系的日益复杂,权力平衡已无法满足国际秩序建构的需要,共有观念建构在国际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性凸显。

2.1 国际秩序建构的路径:从权力平衡到观念建构

何为国际秩序?相关学者结合不同视角有着各自的表述。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系统研究了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秩序的形成和维持问题,其关于国际秩序的定义也被广为引用。布尔认为,国际秩序是指国际行为的模式或倾向,维系着国家间社会的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即确保安全与反对暴力、遵守协议与财产稳定。秩序的形成和维持涉及均势、国际法、外交、战争以及大国等多个制度。次要制度,如国际共同实践、国际组织与机制等,则是在这些首要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并有助于社会生活的发展,从而促成秩序的形成。^②伊肯伯里认为,国

际秩序是关于国际体系如何运行与管理整体性安排,反映了国际格局的力量对比、价值规范以及国际问题的治理路径。^③综合对于国际秩序相关概念的不同表述,可以认为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所遵循的一系列准则和规范的总称,包括国际规范以及国际行为体之间的运行机制。国际秩序与国际格局不同,国际格局指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分布情况。国际秩序在国际格局的基础之上形成,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国际格局稳定。国际秩序中存在着国家的排序,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位置决定了其占有多少全球资源。

由于国际秩序脱胎于国际格局,因此历史上国际秩序的建立大都是从国际权力分布出发,通过国际规范建立一系列相对完善的准则。随着时间推移,国际秩序暴露出新的问题,按照原因可分为技术问题与结构问题,前者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国家博弈最终形成对应国际机制,而后者的出现往往会对国际秩序产生颠覆性影响。无论何种问题,国际秩序的重构与完善,主要是以权力平衡为路径。具体可以理解为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与需求的无限性,在国际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往往以国家权力为基础,平衡多方行为体完成对全球资源划分。就国际秩序建构问题而言,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认为要在国际关系中取得均衡关系。^④结合诸多观点,国际秩序的建构与瓦解同权力平衡的形成

^① Oleg Barabanov, Timofei Bordachev, Yaroslav Lissovolik, Fyodor Lukyanov, Andrey Sushentsov, Ivan Timofeev, "Staying Sane in a Crumbling World", Valdai Discussion Club, May 2020, p.4; Алексей Громыко, "Об иллюзиях Новой Биполяр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5 Мая 2020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ob-illyuziyakh-novoy-bipolyarnosti/>; Thomas Graham, Dmitri Trenin, "Towards a New Model for US-Russian Relations",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August-September 2020, pp.119-134.

^② [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第四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③ Daniel Deudney, John Ikenberry,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2, 1999, pp.179-196.

^④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824-856页。

与打破有着直接关系。此类观点在研究中屡见不鲜,如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认为俄乌危机的根源在于北约东扩破坏了东欧地区原有的权力平衡,进而破坏了整体的欧洲秩序。^①

然而,权力平衡并非构建国际秩序的唯一途径。以权力平衡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往往是国家间权力竞争的结果,具有不稳定性。从国际体系文化的角度看,以追求权力平衡为目标的国际秩序通常源于霍布斯文化或者洛克文化,这两种文化类型都未能摆脱利己主义的影响。在利己主义的推动下,国家对权力的追求导致安全困境的形成,使国际秩序陷入解构与重构的循环。历史上,国际秩序的重新塑造往往伴随着人类巨大的痛苦。但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利己主义的行为之外,也存在着利他主义的愿景,例如中国古代墨家的“兼相爱”和西方基督教的“博爱”。这种愿景在国际体系文化中被归类为康德文化。利他主义有助于国家间建立互利的共识,减轻安全困境的压力,从而推动构建稳定、和平的国际秩序。因此,建构共有观念成为国际秩序建设的新路径。

在国际关系中,观念可以分为身份、意识形态、话语和文化四个范畴。国际共有观念指的是国际社会在这四个方面达成的一致性立场,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价值观,如和平、发展和正义等。尽管对这些价值观存在不同的解读,但仍然在许多相通之处。其次是国家在某一问题上达成的共识。最后是国家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被广泛接受的国际规范。尽管这些规范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国家权力的影响,但由于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长期运行,已被广泛认可为共有观念。不论是人类共同的目标还是国际规范的具体运作,观念在其中发挥着无处不在的作用。

而共有观念发挥重要作用的过程中,某一观念如何从一个国家的观念变为主要国家或多数国家的共有观念成为其中的核心问题。从共有观念的形成来看,个体观念向共有观念的转变所涉及的因素具有复杂性,其中大致有以下

五个方面:

第一,社会互动与传播。观念的传播在社会互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交流、媒体、教育系统等途径接触到不同的观念,这些观念可能会在个体之间传播并逐渐形成共有观念。

第二,教育和教育体系。教育是塑造共有观念的重要渠道之一,国家的教育体系可以通过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师培训等方式传递和强化特定的观念。当人们在教育过程中接受相似的信息和价值观时,更有可能形成共有观念。

第三,历史与文化背景。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对观念的形成和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历史事件、传统习俗、价值体系等都会对人们的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有助于形成共有观念。

第四,社会变革与政治因素。社会变革和政治因素可以对观念的形成和演变产生重要影响。政策变化、领导人的言论、社会运动等都可能在社会中引起观念的变化,政治和社会变革可以推动某些观念成为主流或共有观念。

第五,经济发展与全球化。经济发展和全球化也对观念的演变起着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人们接触到更广泛的观念和文化,这可能导致原有的观念被重新评估或改变,形成新的共有观念。

共有观念的形成需要时间和广泛的社会认同,而且可能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存在差异。综合上述五方面因素,共有观念的形成始终离不开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领域的社会互动。在互动过程中,行为体在群体认同中形成共有观念,这种共有观念作为一个群体或“群我”的一部分的意识,就是社会身份或集体身份,它使行为体具有护持自身文化的利益。^②因此在某一国家的观念向国际共有观念的转变过程中,

^① John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5, 2014, pp. 77-89.

^②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8-339页。

国际社会的互动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综上所述,观念在国际秩序建构与运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国家间有着较强的共有观念时,国家间关系往往呈正向发展,国际秩序的运行与发展也相对稳定。相反,在国家间共有观念较少的情况下,国家间关系往往走向崩溃,从而对国际秩序造成巨大冲击。与此同时,要特别注意共有观念的具体内容。康德文化下的共有观念推动国际秩序正向发展,而霍布斯文化下共有观念同样会加剧国际秩序的不稳定。因此,正向共有观念(相互友善的共有观念)推动国际秩序建构的同时,负向共有观念也推动着现有国际秩序的解构。

2.2 共有观念在国际秩序建构过程中的施动

如今,国际秩序建构过程中权力的作用相较于过去有所下降,观念的作用有所提高。虽然观念依旧无法取代权力,但不可否认共有观念在国际秩序中的施动作用。

首先,观念影响着国际秩序中行为体的身份问题。观念对行为体身份的影响是通过塑造个体的认知、态度和价值观,进而影响其行为和身份认同的形成,其中主要作用于认知和思维模式、个体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行为期望和规范、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以及行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观念对个体的行为选择、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起着指导和塑造作用。在国际秩序中,身份认同决定着—个国家是否可以接受既有的国际秩序并遵照相应的国际规范参与国际互动。国际秩序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共同体,而共同体本质上是文化结构,也就是成员国的集体身份认同发生转换进而推动国际体系转换的过程。^① 国家自身对国际秩序从观念上具备认同的情况下,自身从身份上被确定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对于国际秩序有着较为强烈的执行意愿,反之往往对国际秩序表现排斥。在国际社会中,国家通过明确定位自身身份,以认知自身并了解其他行为体,从而明确国家的利益位置,形成国际范围内的利益分配。这种利益分配不仅影响国际权力的分布,最终也在理念层面转

化为实际的物质影响。同时,对他者身份的认同也影响各行为体在互动中的选择。在相互作用中,行为体通常会基于对他者身份的定位来分析对方权力变化对自身的影响。由于国家在互动过程中对彼此身份的不同定位,权力的作用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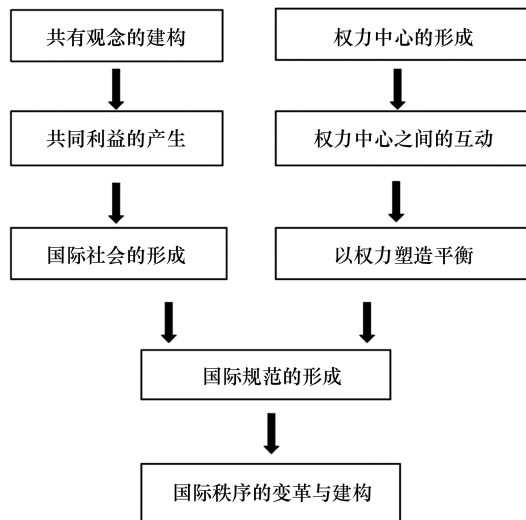


图1 国际秩序建构的权力与观念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其次,共有观念影响着国际规范的确立与运行。参考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国际秩序中所指的一系列准则和规范往往通过具体的国际制度体现。国际秩序是由主导国家以国际制度的形式建构的,当主导国的相对优势逐渐减弱,主导国无法通过之前输出公共产品的方式维护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因此主导国以建构国际制度的方式维护对其有利的世界秩序。^② 将国际制度这一概念泛化为国际规范,即在国际社会中被广泛接受和遵守的准则、原则、行为规范或标准。国际规范通常通过国际法、国际组织、国际公约、国际共识等方式得到确立和推广。在国际规范的形成过程中,非主导国受长期形成的观念影响,往往接受主导国所建构的

^① 郭树勇著:《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33页。

^②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信强、何曜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58页。

一系列国际规范。而在国际规范的建构过程中,共有观念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际规范建构过程以及运行过程的顺利与否。由此可见,共有观念对国际规范的确立和运行将产生重要影响。它们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框架,以便在各个领域内共同解决问题、制定准则和规则,并确保国际行为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同时,共有观念也可以推动国际规范的发展和演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挑战。

最后,共有观念是构成国际社会的重要基础。国际秩序是由多个国家受共同利益和共同观念影响而建立的一整套规则体系,其中各国受共同的规则制约,也享有一定的保障机制。国际秩序的建构过程同国际社会的形成有着一致性,国际社会成员在维持社会基本目标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而实现基本的共同目标需要满足以下三要素:对基本目标的共识;以共同规则约束行为;以合作确保国际规则的有效性。^①结合共有观念来看,第一,在共有观念的诸多表现形式中,共识本身就是共有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第二,如果成员国通过共有规则限制自身行为,前提便是对规则形成集体认同,建构共有观念;第三,国际秩序需要一系列规范来保障,而共有观念则是国际规范建构的重要基础。结合共有观念的具体内容来看,正向共有观念在塑造行为准则、促进合作与协商、维护国际秩序稳定以及强国际信任与合作这四个方面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有助于构建稳定、和谐和互利的国际秩序。

如图1所示,在构建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共有观念和权力平衡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两者从不同的角度影响国际规范的制定,最终共同推动国际秩序的重新塑造。在共有观念和权力平衡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观念路径和权力路径,二者共同构成了国际秩序建构的关键因素。随着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权力路径的作用与共有观念在国际秩序建构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在推动国际秩序建设的过程中,对这两种路径都需要给予高度关注与重视。

三、冷战后中美俄国际秩序观 在互动中的演变

在国际秩序的建构中,基于不同认识,中美俄形成了多样化的国际秩序观。国际秩序观从所在国视角对国际秩序进行应然表述的同时,对其建构路径也有所体现,两种建构路径并存的同时,不同国际秩序观对于观念路径与权力路径侧重不同。

3.1 美国国际秩序观的演进:在“规则”基础上制造平衡

作为国际社会公认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国际秩序的构建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倡导建立“自由世界秩序”,其核心支柱包括“美国领导、伙伴关系以及自由主义价值观”。冷战时期,美国一直努力建立以价值观为基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②旨在在维护世界安全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捍卫美国的利益。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将自身定位为全球的“领导者”,期望将“自由世界秩序”推向巅峰。1993至1998年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参与、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强调了美国在“自由世界秩序”中的领导地位。^③1999年,在科索沃战争的背景下,美国将人权写入核心目标,借此加强对他国内政

① [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5页,第53-59页。

②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91”,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rchive, August 1, 1991, <https://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991/>.

③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93”,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rchive, January 1, 1993;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1994”,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rchive, July 1, 1994;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199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rchive, February 1, 1995;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1996”,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rchive, February 1, 1996;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199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rchive, May 1 1997;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1998”,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rchive, October 1, 1998.

的干涉。^① 一系列举措强化了美国在欧洲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但也加剧了欧洲同俄罗斯之间的隔阂。

“9·11”事件爆发后,美国本土遭受恐怖主义威胁,因此将防范恐怖主义威胁置于对外战略的优先位置。与此同时,美国自视为全球“民主与自由的灯塔”,不仅持续向外输出其价值观,而且采取“价值观同化防止大国竞争再次出现”的策略。^② 这一目标在21世纪的前十年主导了美国外交的发展方向,随后围绕此目标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实践,如发动伊拉克战争、支持“颜色革命”以及颁布《白俄罗斯民主法案》(*Belarus Democracy Act of 2004*)等。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希望凭借自身国力优势塑造单边主义国际秩序,但受国际战略环境影响,美国再次回到塑造权力平衡的路径之上。

由于北约东扩以及武力滥用等问题,普京(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于2007年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对美国进行批判。2008年夏,俄格战争爆发,莫斯科通过战争方式回应了西方国家的挤压。同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经济遭受了严重冲击,在此期间,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面对自身主导的国际秩序不断受到冲击,美国进行了战略调整,声称“应坚持在美国领导下构建可以应对共同挑战的、公正和可持续的国际秩序”。^③ 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美俄之间对抗加剧,西方反俄情绪高涨,美国再次强调其全球领导地位,并强化西方阵营。对华方面,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增强合作的同时对华保持警惕。^④ 但合作并未减轻美国的对抗思维。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后,中美双方在贸易、科技等领域博弈加剧,中美关系日趋复杂。2017年美国提出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旨在“强调美国优先,承认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核心作用”。^⑤ 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美国于2018年展开了对华贸易战,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三边关系日益复杂。蓬佩奥(Mike Pompeo)于2020年7月指出对华接触战略失败,^⑥中美博弈的加剧让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受到强烈冲击。从外交实践看,美国利用

价值观输出、人权外交以及国际规则等一系列方式,以权力平衡为手段,以增加其在国际中的领导力。而俄乌冲突爆发后,美俄矛盾再次升级,“反俄主义”促进了欧洲团结,美国表示将持续维护美国领导地位。^⑦

美国对中俄外交实践中的“双遏制”政策印证了其在2022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俄两国的定位。该报告认为“中俄两国为威权治理与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相结合的大国,与美国所领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形成了对立”。^⑧ 安全战略延续了美国的对抗思维,将“秩序之争”作为未来美俄关系的本质,将中美之争定位为意识形态、全球秩序、规则之争。综合来看美国外交政策主要目标为“保护美国及其公民和盟国、确保继续获得国际资源和市场、维护世界力量平衡以及保护人权和民主”。^⑨ 其中维护世界力量的平衡,表现为对绝对力量的追求并积极干涉各地区事务,通过所谓“保护人

^①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1999”,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rchive, December 1, 1999, <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00-2/>.

^②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rchive, September 17, 2002, <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02/>.

^③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0”,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rchive, May 27, 2010, <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10/>.

^④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rchive, February 6, 2015, <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15/>.

^⑤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rchive, December 18, 2017, <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17/>.

^⑥ Yorba Linda, “Secretary Michael R. Pompeo Remarks at The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 U.S. Embassy in EL Salvador, June 23, 2020, <https://sv.usembassy.gov/secretary-michael-r-pompeo-remarks-at-the-richard-nixon-presidential-library-and-museum-communist-china-and-the-free-worlds-future/>.

^⑦ “Joint Strategic Plan FY 2022–202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March 2022.

^⑧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2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rchive, October 12, 2022, <https://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22/>.

^⑨ “Defining Foreign Policy”, American Government, <https://courses.lumenlearning.com/suny-amgovernment/chapter/defining-foreign-policy/>, 访问时间:2023年4月8日。

权和民主的方式”进行西方价值观的强势输出。

纵观冷战后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即便是美国受战略环境影响而对安全战略有所调整，但是美国以军事安全、经济繁荣与价值观为主要构成要素的国家利益具有明显的稳定性。^①因此不同时期的国家安全报告虽然在语言风格上有所差异，但都强调了美国领导国际社会与主导国际秩序。实际上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凭借其自身实力，在全球范围内建构起了一种多孔化地区秩序，^②以军事、经济等手段在各地塑造权力平衡，进而形成了一系列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冷战结束后，建构多孔化地区秩序这一思维路径依旧没有改变。“美国领导”是其国际秩序观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的规则是一种基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规则，其内部逻辑深受霸权稳定论的影响，即依托自身权力对外建构起维护自身利益的规则体系并积极介入各地区事务塑造权力平衡，建构起美国无处不在的国际秩序。在此过程中，美国所阐述的建构共有观念往往是美国价值观的输出，将价值观视作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领导力的工具，对意识形态异于自身的国家表现出了较大排斥，并力图改变对方同自身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由此，这一系列共有观念往往成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甚至诉诸武力的借口。

3.2 俄罗斯国际秩序观的演进：从始至终的大国平衡

冷战后，俄罗斯对国际秩序开始了新的探索。早期俄罗斯认为苏联解体是其民主化的自主选择，而非斗争失败，明确将发挥大国影响力作为外交重点，促使美国承认其大国地位。^③从《美俄伙伴和友好关系宪章》到《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I)的签署，俄罗斯有着与美国共建国际秩序的期许。1994年俄美双方签署《莫斯科宣言》，宣布双方进入成熟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④进一步增强了俄罗斯的信心。然而“平等伙伴关系”的构想不仅和美国单边世界的目标相违背，也让俄罗斯面临巨大压力。因此，随着波黑战争中被边缘化，俄罗斯开

始谋求以多极维护其在国际秩序中的大国地位。

俄罗斯多极化外交最早是由普里马科夫(Евгени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римаков)提出。俄罗斯判断当时国际秩序有着两种趋势，一种是多极化，另一种是单边主义，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将致力于完善全球多边机制，推动多极化发展。^⑤俄罗斯的多极化外交承认了俄罗斯的衰落，无法单独实现平衡情况下，试图以多边制衡美国，以此维护自身世界性大国地位，建构一个由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但由于俄罗斯的多极化外交对外政策缺乏一致性以及设想的大国之间利益的差异性，未能形成多极化的合力。随着北约与欧盟的相继东扩，多极化外交未能实现预期目标。

21世纪初，随着普京上台，俄罗斯对外战略进行了新的调整。普京从爱国主义、国家地位与社会团结三个方面号召重建一个强大的俄罗斯。^⑥基于强国目标，俄罗斯力求在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基础上，建立一个稳定、公平和民主的世界秩序，在多极化外交中增加务实，突出国家立场。^⑦随着俄罗斯对美国反恐的支持，国际地位恢复的同时俄美关系拉近，自身对国际议

① 邢悦、陆晨：“对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文本分析”，《国际论坛》，2019年第5期，第3-23页。

② [美]彼得·卡赞斯坦著，秦亚青、魏玲译：《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③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992”，<https://www.russiamatters.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files/1993%20Foreign%20Policy%20Strategy%20RUS.pdf>，访问时间：2022年7月12日。

④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Boris Yeltsin of Russia in Moscow”，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January 14, 1994,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the-presidents-news-conference-with-president-boris-yeltsin-russia-moscow-3>.

⑤ “Концеп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Armscontrol, 17 Декабря 1997г, <https://www.armscontrol.ru/start/rus/docs/snconold.htm>.

⑥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30 Декабря 1999г, https://www.ng.ru/politics/1999-12-30/4_millennium.html.

⑦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00”，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1 Июля 2000г, https://www.ng.ru/world/2000-07-11/1_concept.html.

程的关注也有所提高。在2008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表现出了建构国际新秩序的抱负与恢复大国地位的雄心。与此同时,俄罗斯提出了构建一种基于国际社会承认的、秉持不可分割安全原则并反映其多样性的国际关系架构。^①然而美国目标依旧是构建单边主义国际秩序,同俄罗斯存在明显的矛盾。俄格战争后,布什(George Walker Bush)称“俄罗斯成为自由议程中让人失望的一页”。^②双方矛盾日益凸显,国际秩序发展愈发复杂。对此俄罗斯在2013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提出“维护自身作为世界权力中心的地位,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特殊责任”。^③这不仅体现了俄美国际秩序观间的矛盾,也预示了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主动性增强,为俄乌危机埋下伏笔。

随着美国主导的欧洲秩序东扩,乌克兰被逐渐拉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引发了俄罗斯本体安全危机,冲击了俄罗斯国际秩序观中的大国定位,俄乌危机随之爆发。由于同西方国家矛盾日益严峻,俄罗斯加强了战略东移。莫斯科认为,世界变革本质在于多中心国际体系形成,世界力量和发展潜力正在分散并向亚太地区转移,同美国只有在平等、相互尊重利益和互不干涉的基础上才能开展对话,主张建立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全欧洲安全体系。^④中俄关系升温的同时,中美在贸易、台海等方面矛盾日益突出,使中美之间关系复杂性进一步增强。

2021年12月,俄罗斯所主张的建立全欧洲安全体系被否定,^⑤次年二月俄乌冲突爆发,俄罗斯同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再度升级,普京认为这是俄罗斯对美国自冷战后的排他性而做出的反击。^⑥随着国际秩序层面博弈加剧,俄罗斯于2023年3月重新修订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指出在国际关系中权力因素增强、大国冲突风险加剧的同时,面对西方敌对行为,俄罗斯将通过一切手段捍卫生存权和自由发展权。^⑦

纵观俄罗斯自冷战后国际秩序观的演变,虽然其中闪烁着公平、公正以及安全不可分割

等正向观念,但依旧未能跳出权力因素主导的固有思维,也未能摆脱在国际秩序建构过程中对权力平衡的路径依赖。由于长期受欧亚地缘政治以及弥赛亚主义思想的影响,^⑧俄罗斯国际秩序观中不变的核心便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在大国主导基础上以权力平衡建构的国际秩序,俄罗斯永远是重要一极,将构建公正和可持续的国际秩序作为外交政策优先方向的同时,巩固俄罗斯作为现代国际社会中的一个负责任、有影响力和独立的中心地位,^⑨这一系列目标体现的大国身份的定位,在俄罗斯秩序观中基本不会改变。

3.3 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演进:逐步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相较于美俄两国,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探索起步较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际秩序的相关论述都是基于两极格局,如

①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08”,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15 Июля 2008г, <http://kremlin.ru/acts/news/785>.

② [美]乔治·沃克·布什著,杨晨曦等译:《抉择时刻》,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406页。

③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13”, Законы, Правила и Полож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Февраля 2013г, <https://legalacts.ru/doc/kontseptsiya-vneshnei-politiki-rossiiskoi-federatsii-utv-prezidentom/>.

④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0. 11. 2016г. № 640: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30 Ноября 2016г, <http://kremlin.ru/acts/bank/41451>.

⑤ Steven Pifer, “Russia’s Draft Agreements with NATO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nded for Rejection?” Brookings, December 21, 2021,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1/12/21/russias-draft-agreements-with-nato-and-the-united-states-intended-for-rejection/>.

⑥ Ruptly, “Путин Заявил, Что у Границ России Готовилось Нападение, В Том Числе на Крым”, Тасс, 9 Мая 2022г, <https://tass.ru/politika/14580359>.

⑦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23”,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31 Марта 2023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0811>.

⑧ [俄]瓦列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著,于宝林、杨冰皓译:《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⑨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23”,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31 Марта 2023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0811>.

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① 改革开放后,中国深化了对国际秩序的探索,1985年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②

随着冷战的结束,新的国际秩序尚未形成,中国在这一背景下对国际新秩序的发展进行了新的阐述。1995年,江泽民从安全、国际环境、国际关系准则、经济关系以及共同挑战五个方面描述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97年,江泽民再次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自主性、国际平等、和平与合作五个方面对国际新秩序进行了阐述。与同时期的美俄两国相比,中国在建构国际秩序问题上强调了国际共识的作用,而非强调领导地位与权力平衡。然而,中国对于国际秩序的阐述并未完全实现。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轰炸,中美关系被阴影笼罩的同时,也体现了双方在国际秩序观中存在的矛盾。中国认为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阻碍了国际新秩序的形成。^③

进入21世纪之后,受“9·11”事件影响,国际社会整体上进行了战略调整,国际环境出现了缓和。2003年,胡锦涛指出国际局势总体稳定,但不确定因素增加,各国应加强合作,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开始了对国际秩序建构路径的探索。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新的挑战接踵而至,中国围绕安全、发展、合作以及国际社会四个方面对如何建构国际新秩序进行了阐述。^④ 中国国际秩序观逐渐开始清晰化、系统化。

随着对国际秩序的探索日益推进,中国的国际秩序观理论化程度日益加深。2012年,随着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⑤人类命运共同体被首次提出。经过一系列外交实践之后,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从安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流与生态体系四个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深入阐述。随着中国外交事业的不断推进,新议题被补充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2017年,习近平主席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以及生态建设五个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全面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国际权力观、共同利

益观、可持续发展观以及全球治理观出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现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对接,将全人类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被逐渐内化,理念深入到了上合组织发展、金砖国家建设等多个领域的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得到了丰富完善和发展。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⑥ 2023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的颁布,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目标之一。^⑦

纵观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形成过程,中国国际秩序观逐步走向成熟,理论内涵也在日益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内涵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观,摒弃冷战思维,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对话协商,以包容性思维代替对抗性思维;第二,树立新的共同利益观,摒弃零和思维,强调兼收并蓄、利义相兼、以义为先;第三,提出新的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摒弃传统为实现眼前利益而破坏长远利益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⑧ 就学理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国际关系

① “毛泽东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一条线’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wjs_674919/2159_674923/200011/t20001107_10250994.shtml, 访问时间:2024年1月20日。

② 邓小平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③ 江泽民:“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人民日报》,1995年10月25日,第1版;江泽民:“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人民日报》,1997年4月24日,第6版;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发表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9月7日,第1版。

④ 胡锦涛:“世代睦邻友好 共同发展繁荣”,《人民日报》,2003年5月29日,第1版;胡锦涛:“同舟共济 共创未来”,《人民日报》,2009年9月25日,第2版。

⑤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1版。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人民日报》,2023年6月29日,第12版。

⑧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22年版,第81-82页。

理论中的共生理论有着相通之处。共生理论认为,当代世界是多元多样性和合共生的世界,和合共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存在形式、结构形式、发展形式,也是人类改善生存环境舒适度、满意度的最佳途径。^①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是个体性与群体性、独立性与共生性的对立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各国之间在相互联系与相互依附中实现发展,也塑造了国际交往中的伙伴关系,形成一种全球范围内的和合共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②以此回应着全人类的共同话题。从“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从观念到实践的转化。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术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作用于具体的外交实践之外,也丰富、发展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联通。

因此,在国际秩序的建构过程中,权力与观念发挥共同作用的同时,不同国家的国际秩序观中对建构路径有着不同的侧重点。横向比较中美俄国际秩序观的演变过程,相较于美俄国际秩序观中对权力的依赖,中国没有追求自身特殊地位的同时,还主张规避国际权力对抗。中国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强调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共建共享、包容共生的意识,以建构包容性全球共有观念为路径,实现各国共同发展,这一点也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秩序建构路径中的创新性。

四、中国国际秩序观中倡导的 共有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成果之一。与和平发展道路、全球伙伴关系等其他精髓要义一道,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结晶。^④在马克思看来,“联合体”与“共同体”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重要概念,在共同体条件下个人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实现个人与集体利益的统一,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得以解决。“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项重要理想追求,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恰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全球范围内的伟大实践。

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天下”思想,即“天下”概念体现出了从整体利益考虑的世界观念。^⑤目前普遍认为1648年是国际关系史的开端,但这一观点是片面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只作用于欧洲,直到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东亚才真正意义上被拉入到西方建构的国际秩序之中。这一国际秩序不是全人类共同建构的产物,而是一种强权体现,无法体现全人类的共同愿景。相较于欧洲,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从古代的畿服制度到现代国家的治理,中国在尊重内部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注重对中华文明的建构与认同,从而形成中华文明共同体。基于历史上形成的文化的包容性,中国乐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建构包容性的共有观念,进一步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发展、开创丰富的人类共有文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时代交汇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⑥人类命运共同体蕴涵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认识,是中国国际秩序观发展的最新成果。

① 金应忠:“再论共生理论——关于当代国际关系的哲学思维”,《国际观察》,2019年第1期,第14-35页。

②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人民日报》,2023年2月22日,第15版;习近平:“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人民日报》,2021年9月22日,第2版;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人民日报》,2023年3月16日,第2版。

③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版,第1-10页。

④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22年版,第79页。

⑤ 赵汀阳著:《天下体系》,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0-109页。

⑥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1版。

相较于美俄对权力平衡的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突出强调对共有观念的建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是一种着眼于中国和世界共同利益的国际秩序观。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① 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在国际社会形成一种包容性的共有观念,这种观念不同于以往从本国出发的个体理性,而是一种从全人类视角出发的集体理性,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平、多元、发展的国际秩序。结合中国领导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论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应积极从以下几方面推动包容性共有观念的形成。

第一,摒弃大国优越感,建构国际平等观。在过去以权力平衡为路径建构的国际秩序中,大国往往是一种超脱于国际规则的存在,这是一种强权政治的体现,其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国际共有观念中的国家间不平等。国际社会平等观亟待加强,对于实力差异,要进行思维的转变。大国身份意味着对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垄断。^② 国际平等观的建构并非消灭大国,而是推动霸权国向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转换。

第二,摒弃零和思维,构建合作共赢。在权力平衡建构的国际秩序中,国家间零和博弈的思维会加剧彼此间对抗。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需要共赢的理念,而合作共赢恰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追求的目标。^③ 因此在国际交往中,各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应着眼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从整体理性出发,树立全球利益不可分割的理念,建立共建、共享、共赢的发展之路。

第三,摒弃对抗思维,树立共商意识。权力平衡下的国际秩序往往伴随着结盟与对抗,体现了国际社会中共商意识的缺乏。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用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具体到大国关系中则是: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④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际社

会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国家间协商解决问题,共同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第四,摒弃合作中的“山头主义”,强化合作中的发展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全球治理出发点是解决问题,合作的目标是发展,而非拉拢盟友、大搞对抗。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不同场合对包括国际政党合作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阐述。^⑤ 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多的关注点在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坚持以正确义利观为引领,^⑥而非以援助名义介入地区事务并以此争夺“战略要地”。与此同时,发展的目标并非对抗,而是在发展优先与以行动为导向的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⑦

第五,摒弃领导地位,遵循共同价值。在美俄国际秩序观中,都强调了自身领导地位或大国主导地位,背后逻辑都是以自身权力为基础,以权力平衡为路径,以主导国际秩序为目的。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指出:要继续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⑧ 中国以参与者身份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⑨

第六,摒弃门户之见,坚持开放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中国模式”的输出,而是主张基于多元模式基础上的和谐共生。人类命运共

①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版,第48-60页。

②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62页。

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编选(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53-354页。

④ 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3页。

⑤ 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33-475页。

⑥ 张中元:“正确义利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治理”,《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9期,第67-76页。

⑦ 习近平:“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人民日报》,2021年9月22日,第2版。

⑧ 习近平著:《论坚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53-254页。

⑨ 习近平著:《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58-459页。

同体具有明显的包容性,主张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主张多元发展模式。^① 人类命运共同体摒弃了国家之间与文明之间的门户之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与不同国家交流互动。在全球治理中,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而是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②

第七,摒弃安全困境,构建共同安全。中国从理念出发,提出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指引,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主张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从而实现普遍安全、共同安全。^③ 安全共同体打破了安全方面的零和思维,因应安全问题的发展趋势,为国际安全提供了新思路与国际法保障。^④

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在全球范围内建构一种超越权力且具有包容性的共有观念,由此形成互利共赢的国际秩序,营造共创未来的国际环境,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一系列共有观念的基础上,中国就全球治理问题,先后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及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全球倡议”不仅是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重大贡献,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体现,更是一种观念作用于实践的表现。在此基础上,中国在全球事务中不断的发挥作用,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如积极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的和解外交、密切中亚合作等。^⑤

五、三边互动下中国国际秩序观中的战略抉择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的主要内容,较于美俄更为凸显观念建构的重要性。权力平衡往往通过对抗完成国际秩序的建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全人类视角出发,主张开放包容、多边协商,规避国际对抗,建构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国际新秩序。从共有观念建构

出发,结合中美俄三边互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应着力以下四个方面。

5.1 依托权力基础,保持发展中的战略定力

虽然中国国际秩序观中在建构路径方面侧重于观念建构,但并不等于否定权力在国际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性。在国际秩序的建构过程中,权力路径与观念路径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中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依然需要以自身为基础。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来讲,以往以权力为主导在国际秩序中确立的霸权稳定或者大国主导是一种“霸道”的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建构过程中强调的共有观念本身则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德治”理念,这是一种“王道”的体现。然而无论是“霸道”,还是“王道”,都需要实现自身的强大。

在国际秩序观的差异对比中,美国对华竞争尤为激烈。2022年5月,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对美国有着更大的“威胁”,提出要塑造中国周边环境。面对美国压力,中国应保持自身的战略定力。中国自身的发展是解决中美问题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有力保障。国家权力决定着国际话语权的多少,中国增强国际话语权,将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全球共有观念提供重要保障。

5.2 依托伙伴关系,推动中俄关系良好发展

自俄乌危机以来,美国对中俄双向施压愈发明显,在此背景下中俄关系不断拉近。中俄双方从维护自身战略灵活性出发,未建立同盟关系,而是形成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关系在

①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编选(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1-42页,第734-735页。

②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人民日报》,2023年3月16日,第2版。

③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人民日报》,2023年2月22日,第15版。

④ 杨泽伟、张晟:“全球安全倡议的国际法内涵及其实施路径”,《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4期,第1-12页。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沙特阿拉伯王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三方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3年3月11日,第7版;“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人民日报》,2023年5月20日,第2版。

2019年被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进一步强化双向施压,压缩中国战略回旋空间。中国避免选边站的同时,也要推动中俄关系健康发展。对此中国于2023年2月24日围绕俄乌问题,提出了十二点倡议,其中内容凸显共有观念在处理国际问题中的价值,^①这一系列共有观念也是中俄关系所需要坚持的重要理念。

在推动国际新秩序建构过程中,俄罗斯在一些领域同中国有着共同诉求,如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战略稳定、确保国家与民族的和平共处和不断发展。^②与此同时,在俄罗斯的秩序观中也存在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近的观念主张,如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中俄关系的健康发展对中国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稳定器的作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与建构过程中,应对中俄伙伴关系予以高度重视。在对俄外交保持自我判断力的同时,扩大两国国际秩序观的公约数,保障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5.3 依托国际战略,增强对美外交的灵活性

虽然当前中美关系出现波动,但美国依旧处于中美俄三边关系的战略顶点,中美关系对华有着重要的意义。中美关系波动将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全球共有观念带来严重阻碍,因此对中美关系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美国《2022—2026 财政战略计划》显示,美国对世界经济与气候问题有着较高关注,^③共同关注点为中美对话合作提供可能。2022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同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进行会晤,拜登表示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新冷战”,承认“一个中国”。^④不仅如此,在美国对俄乌冲突的立场中同样有着尊重《联合国宪章》与尊重领土及主权完整的相关表述。^⑤美国对中美关系同样保持着高度重视,中美存在建构共有观念的可能,然而美国并非言行一致。2022年2月美国发布《美国印太地区战略》,明确将台海问题纳入其战略目标。^⑥同年8月佩洛西(Nancy Patricia D'Alesandro Pelosi)窜访中国台湾,9月参议院通过了《台湾政策法案》。^⑦美国

对台湾问题的走向从模糊到日趋清晰,其外交行为印证着塑造中国周边环境的战略设想。

中美之间存在共同目标的同时,美国围绕国际秩序问题,在对华关系中表现出愈发明显的博弈色彩。因此中国在同美国的外交工作中,应增强对美工作的灵活性,保持着“斗而不破”的关系。同时,在对美外交不应只是“见招拆招”,而是要“积极进取、寻求突破”。在关注国际博弈的同时,对美国国内因素予以重视,在中美关系中增加新的议题,寻求扩大公约数的契机。

5.4 依托国际传播,建立国际交流的桥梁

在国际共有观念的建构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其中的重要媒介。近年来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相关领域的研究逐渐增多,传播学专业的介入,让这一领域的研究愈发专业化。在国际传播过程中,中国应积极实现以下三个目标。

第一,借助中华文化,让世界读懂中国。从“天下”到“兼相爱”,再到“大同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共鸣。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需要加强中华文化的传播深度,便于其他国家理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第二,防止例外主义,让世界走近中国。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追溯到中华传统文化,但

① “中国外交部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人民日报》,2023年2月25日,第5版。

②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23”,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31 Марта 2023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0811>.

③ “Treasury Strategic Plan 2022–2026”,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2022.

④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举行会晤”,《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5日,第1版。

⑤ “United with Ukrain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21, 2022, <https://www.state.gov/united-with-ukraine/>.

⑥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1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⑦ “S.4428—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 Congress. Gov, September 15, 2022,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senate-bill/4428/text>.

也不是中国所独有。西方国家也有着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举措,有着诸如“相互依赖”的理论观点。在国际传播中,中国要避免滑入例外主义的陷阱,而是要应推动东西理论间的对话,拉近彼此在观念层次的距离,助力包容性共有观念的产生。

第三,立足外交实践,让世界认可中国。外交实践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除理念层次的国际传播之外,在共有观念的建构过程中,要以问题为导向、以外交实践为依托,积极完善与全球发展倡议相关的国际制度,^①努力回应并解决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与扬清激浊国际思潮的迷思等一系列时代话题。^②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范围内落地、生根、结果。

六、结 语

在国际秩序建构过程中,建构路径并非单一的。寻求权力平衡发挥作用的同时,共有观念同样发挥着重要影响,由此形成了权力路径与观念路径。受具体文化与外部环境的影响,不同国家所提出的国际秩序观在秩序的建构路

径上对于两种路径有着不同的侧重,造成了不同国际秩序观之间的差异性。

在中美俄互动中,不同的认识形成了不同的国际秩序观。较于美俄的权力平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是全人类共同利益。在建构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承认权力作用的同时突出了共有观念在国际秩序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在规避路径依赖的同时为全球治理提出了更为多元的新理念。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国,中国应从理念与实践两个维度入手,在传播新理念的同时,不断呼应既有理念中的共通之处,逐步做到东西方理念的沟通、联通与畅通。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回应全人类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实践中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及全球文明倡议,推动合作共赢,塑造全球范围内的和合共生。最终,以实践检验人类命运共同体,让更多人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主张与举措,进一步助力包容性共有观念的形成,增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认同度。

责任编辑 邵雯婧

^① 王明国:“全球发展倡议的国际制度基础”,《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9期,第35-47页。

^② 杨洁勉:“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探析”,《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第1-19页。

Shared Ideas in the Path of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 A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in Views on International Order of China , the U.S. and Russia

KE Yan¹ BI Hongye¹

(1.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China*)

Summary :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has undergone major changes.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its evolution and trajectory, resulting in the emergence of different view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pathway to construct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s far from singular. While the pursuit of power equilibrium undoubtedly holds sway, the influence of shared ideologies cannot be overlooked. Consequently, two distinct paths emerge. The one is driven by power dynamics while the other is determined by ideological consensus. These paths are shap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specific cultural context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ultimately leading to divergent views o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Differences in views on international order are reflected i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global powers such a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emphasize power balance, China champions the concept of 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being recognized as an ideology rooted in the collective interests of humanity. Based on this, China emphasizes the role of shared idea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provides innovative means for global governance, and avoids path dependence.

Advocating 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based 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volves not only promoting novel concepts, but also integrating them with existing commonalities, thereby promoting communication and synergy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ideolog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China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actively implements initiatives of global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civilization. Through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a broader range of shared ideas can be obtained, thereb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Key words : Shared Ideas; International Order; Sino-US-Russian Interaction; 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